

隨筆·觀察

纏足、割禮與 中國的「後、新」之學

● 雷 頤

女子纏足曾是中國幾朝相沿、幾近千年的習俗。「三寸金蓮」被認為是文明、教養、禮法和美的象徵，而自然的「天足」反被譏為「大腳婆」，是野蠻醜惡、傷風敗俗、大逆不道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廢纏足」幾可謂「難於上青天」，因此纏足之廢的意義與功德均不可謂不大（當然是以現已不夠摩登的「現代」為標準）。

說來頗令國人汗顏，纏足之廢，首功要推近代來華的西方傳教士。1879年，一位傳教士在廈門的教民中首先倡導不纏足，創立「戒纏足會」。美國傳教士林樂知 (Young John Allen) 辦的《萬國公報》(最初名為《教會新報》) 對此事有詳細報導，而後又發表了〈戒纏足論〉、〈裹足傷仁〉、〈革裹足敝俗論〉、〈裹足論〉、〈勸戒纏足論〉等一系列有關文章，指出纏足是「自傷肢體」，「無故而加以荊刑之刑」，「其為傷生理、恣荼毒、造永劫，蓋莫此之為甚也」。並認為纏足對下層勞動婦女的生計影響尤為嚴重。這些文章影響甚廣，康有為就是讀了《萬國公報》的這些文章後，才在廣東組織「不纏足會」的。維新時期，南方各地紛紛成立「不纏足會」，戒纏足運動開始形成。「不纏足會」除宣傳纏足危害、鼓勵不纏足外，

重要的一點是會員子女可互為嫁娶，免去「天足」嫁不出去之憂。但戊戌政變發生，各種「不纏足會」被迫解散，不纏足運動面臨被摧之險，幸賴西方在華婦女在各地成立的「天足會」仍不遺餘力(外國人辦團體不受清廷禁令束縛，這種「不遺餘力」實乃「侵犯主權」)，才使這一運動得以延續。1902年經庚子巨變之後，清廷在內外壓力之下終於諭令勸止纏足，不纏足運動才重又興起，並獲得「合法性」，終成主流。

無獨有偶，割禮是在非洲不少國家已盛行四千多年的習俗，對婦女危害不淺，雖有不少有識之士努力廢絕這一惡習，但至今未能斷絕，平均每天仍有六千名女孩經受刀割。最近，世界名模迪里成為割禮宣戰的「特別使者」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。現年30歲的迪里出生於索馬里，5歲時被行割禮。當時，一名老婦用一把沾滿血迹的刮鬍刀在她的會陰部切割着，她拼命掙扎、大聲嚎叫幾下便頓時痛昏過去。一個多小時後，當她醒來看到自己血肉模糊的下身時，媽媽卻高興地對她說：「你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了。」13歲那年她來到英國倫敦打工，幾年後成為亭亭玉立的少女，被數家世界著名的服裝公司聘為專門模特，

成為世界公認的名模。直到成為名模後，她才知道原來世界上多數婦女並不割禮。此前，她一直認為割禮是天經地義之事，世界上所有女人都要經受割禮。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，她下定決心向割禮宣戰。由於「名模」知名度高，她的行為受到廣泛的注意、重視和支持，聯合國有關機構現任命她為特使，到非洲各國做同胞的工作。她向同胞宣講割禮的巨大危害，認為這是一種犯罪，勸說女性珍愛自己的身體，呼籲男青年去愛那些沒有接受割禮的女性。她的工作頗有成效。不過，她在家鄉並不完全受歡迎，被一些頑固維護傳統的人罵為民族的「叛徒」。

同一件事，可以用不同的理論框架進行「解讀」，從而得出不同的結論。若用時下國內學界開始流行的「後學」和「新左」理論對「戒纏足」和「廢割禮」進行解讀，庶幾可得出如此結論：近代中國由傳教士首先發動的「戒纏足」和現在非洲正在進行的與跨國公司和一些國際組織關係密切的「廢割禮」，正是由西方的傳教士和跨國公司進行的「殖民」和「後殖民」的體現和證明，它們以現代性的虛偽的啟蒙、理性為標準，將東方／第三世界的傳統和習俗斥之為蒙昧、野蠻、不衛生，實質仍是西方中心論。福柯(Michel Foucault)對西方的啟蒙、理性和醫療衛生已有深刻解構，指出這些統統都是一種控制手段，我們要破除纏足、割禮等有害身體的現代性「迷思」……名模迪里已「他者化」成為跨國公司的符碼，其功能與當年在華傳教士並無二致。跨國資本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正在破壞本土習俗和千百年的傳統，正在無情而迅速地消滅多樣性，如從前有近四分之一的婦女纏足而現在幾乎沒有一個！這樣，全球婦女都一模

一樣的天足大腳而無那「柔若無骨，愈親愈耐撫摩」的「三寸金蓮」，致使步步婀娜多姿、搖曳生姿這種絕佳的「人文景觀」終於消失。行割禮的婦女目前正在慢慢減少，如果現在不汲取當年中國「纏足戒」而「金蓮絕」之殷鑒，對此喪失警惕，終有一天將無人「割禮」，全球婦女的下身亦將大體一樣，使人類的多樣性再次減少。所以，東方／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當務之急，是用西方的「後現代／新左」這種「學術最前沿話語」來抵制、反對、破除、解構西方的「現代性／啟蒙」這種學術上已經「過時」的「殖民主義話語」，維護並恢復本土的各種習俗和制度……。

這種理論一反「現代性」的常說，給人耳目一新之感，的確更加誘人。不過，不知中國的「後學」、「新左」之士在洋洋灑灑之際是否想過自己(如果是女性)是否願意被「纏」被「割」，或是否願意讓自己(如果是男性)的妻女姐妹被「纏」被「割」。因為僅在學者的書齋中和厚厚的學術專著中「玩學術」，旁徵博引福柯、阿明(Samir Amin)、德里達(Jacques Derrida)、德利克(Arif Dirlik)、傑姆遜(Fredric Jameson)、薩伊德(Edward W. Said)、李歐塔(Jean F. Lyotard)、馬爾庫塞(Herbert Marcuse)、華倫斯坦(Immanuel Wallerstein)等等西方諸位「後」、「新」鴻儒碩學的種種「話語」，當然只有高深博學而於實際生活並無大礙。然而，一旦某些理論(很可能會)走出書齋而「落在實處」，結果確會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產生實實在在的「切膚之痛」！

雷頤 1956年生，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《近代史研究》副主編、副編審。